

宋代文学研究

(上册)

张摇毅摇著

北京出版社

目摇摇录

上摇摇册

第一章摇绪论	(员)
第一节摇清末民初 (员愿—员圆)	(圆)
第二节摇三四十年代 (员圆—员源)	(员)
第三节摇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 (员缘—员)	(圆)
第四节摇最后二十年的繁荣 (员—员)	(源)
第二章摇词学研究(上)	(远)
第一节摇概说	(远)
第二节摇词乐与词律	(远)
第三节摇词体与词派	(愿)
第三章摇词学研究(下)	(员)
第一节摇词史及通论	(员)
第二节摇词论与词学理论批评	(员)
第三节摇词籍整理和选注	(员)
第四章摇宋诗学研究(上)	(员)
第一节摇唐宋诗之争	(员)
第二节摇宋诗特征	(圆)
第三节摇宋诗的分期、体派、作品整理	(圆)
第五章摇宋诗学研究(下)	(圆)

第一节摇宋诗话研究	(圆缘)
第二节摇严羽及其《沧浪诗话》	(圆远)
第三节摇诗学思想及理论建构	(圆愿)
第六章摇宋文研究	(圆远)
第一节摇宋代古文运动	(圆远)
第二节摇宋代散文的特色	(猿园)
第三节摇宋文的主要文体样式	(猿园)
第四节摇宋人文集的整理	(猿圆)
第七章摇小说戏剧研究	(猿圆)
第一节摇宋代的讲唱文学	(猿圆)
第二节摇话本小说研究	(猿苑)
第三节摇讲史评话及其他	(源圆)
第四节摇宋杂剧与南戏	(源圆)
第八章摇北宋初期文学研究	(源缘)
第一节摇宋初文坛的复古倾向	(源缘)
第二节摇王禹偁与宋初诗风和文风	(源缘)
第三节摇杨亿与西昆体	(源愿)
第四节摇晏殊、林逋和宋祁等人	(缘缘)

下摇摇册

第九章摇北宋中期文学研究	(缘园)
第一节摇梅尧臣、苏舜钦	(缘园)
第二节摇王安石研究	(缘圆)
第三节摇曾巩、苏洵、苏辙	(缘圆)
第四节摇苏门文人与陈师道	(缘圆)
第五节摇柳永及其词	(缘圆)
第六节摇秦观词及诗	(远缘)

第七节	摇张先、晏几道、贺铸	(远贞)
第八节	摇其他(范仲淹、王令等)	(远缘)
第十章	摇欧阳修研究	(远园)
第一节	摇生平与思想研究中的问题	(远园)
第二节	摇欧阳修与诗文革新运动	(远猿)
第三节	摇欧阳修的散文艺术	(远贞)
第四节	摇欧阳修的诗和词	(远贞)
第五节	摇欧阳修的文学思想	(远缘)
第十一章	摇苏轼研究	(远园)
第一节	摇生平、思想与文化品格	(远猿)
第二节	摇苏轼的诗歌艺术	(苑园)
第三节	摇苏轼的散文成就	(苑贞)
第四节	摇苏轼词研究	(苑园)
第五节	摇苏轼的文艺观	(苑猿)
第十二章	摇黄庭坚研究	(苑愿)
第一节	摇生平与思想	(苑愿)
第二节	摇黄庭坚的诗歌艺术	(苑猿)
第三节	摇山谷词评说	(苑猿)
第四节	摇黄庭坚的诗论和文艺观	(苑圆)
第十三章	摇南渡前后文学研究	(愿愿)
第一节	摇周邦彦研究	(愿愿)
第二节	摇张元 ^幹 、张孝祥、岳飞	(愿贞)
第三节	摇吕本中与江西诗派	(愿圆)
第四节	摇陈与义研究	(愿缘)
第五节	摇朱敦儒、朱淑真、叶梦得	(愿缘)
第十四章	摇李清照研究	(愿园)
第一节	摇生平事迹与著述考辨	(愿园)
第二节	摇李清照的性格与思想	(愿缘)

第三节摇“易安词”及其艺术成就	(怨缘)
第四节摇李清照的诗和文	(怨圆)
第五节摇李清照的《词论》	(怨愿)
第十五章摇辛弃疾研究	(怨源)
第一节摇辛弃疾的生平及作品考辨	(怨源)
第二节摇辛弃疾的思想和人格	(怨圆)
第三节摇辛词的艺术贡献	(怨缘)
第四节摇辛词的分类研究	(怨圆)
第五节摇诗文创作及其他	(怨圆)
第十六章摇陆游研究	(怨圆)
第一节摇陆游生平和思想的若干问题	(怨圆)
第二节摇陆游的诗歌艺术	(怨圆)
第三节摇陆游的词、散文、文学批评等	(怨圆)
第十七章摇南宋中期文学研究	(怨源)
第一节摇杨万里及其“诚斋体”	(怨源)
第二节摇范成大研究	(怨圆)
第三节摇姜夔的“白石词”及其他	(怨圆)
第四节摇朱熹的文学成就	(怨缘)
第五节摇其他作家	(怨圆)
第十八章摇南宋后期文学研究	(怨圆)
第一节摇永嘉四灵	(怨圆)
第二节摇江湖诗派	(怨圆)
第三节摇刘克庄研究	(怨圆)
第四节摇吴文英及“梦窗词”	(怨圆)
第五节摇张炎、王沂孙、周密、蒋捷	(怨圆)
第六节摇文天祥与其他遗民作家	(怨圆)
后摇记	(怨缘)

第一章 绪论

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与中国文化的传承和革新紧密相关，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承续，它表现为对宋代文学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目的是让今人能了解和读懂宋代的文学作品，陶冶情操，汲取精神营养，提高审美能力和艺术水平。但在中西学术文化碰撞引发的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中，它的文学史意义，又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返本开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返本，只移植照搬西方文化，则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难以在中国土地生根；返本而不能开新，在由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变革中，抱残守缺者又将为时代所抛弃。故传统与现代化、旧学与新知之间的对峙和兼容，是我们在回顾20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时难以回避的文化问题。换言之，宋代文学虽属于传统国学一个部门的分支，却与20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它的起步，它的发展，它的变化，无不受时代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潮变迁的影响，大多数研究者都无法完全超越于他所生活的时代，其研究成果也都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打上了时代烙印。

在本书的开篇，我们把20世纪宋代文学研究分为四个历史阶段论说，即清末民初、三四十年代、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以及20世纪的最后二十年。着重于就各个时期宋代文学研究与社会政治及学术文化思潮的关系，不同时期有代表性的宋代文学研究者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贡献，以及可以代表一

《词林正韵》，使倚声者知审音，三是张惠言《词选》出而后倚声者知尊词体，四是朱祖谋校词精审，可比美于清代朴学大师，“而后校讎乃有专家。”^①

朱祖谋曾从王鹏运学作词，**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时，两人在围城中作《庚子秋词》二卷，感时愤事，表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和对清王朝腐朽无能的不满。这些词作在其《彊村语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彭靖《“试画虞渊落照红”——论 彊村语业》说：“彊村词，结束了词学的旧时代；开拓词学的新时代，则有待于来者，叶恭绰在《广篋中词》中说：‘彊村翁词，集清季词学之大成，公论翕然，无待扬榷。余意词之境界，前已开拓殆尽。今兹欲求于声家特开领域，非别寻途径不可，故彊村翁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开来启后，亦有继起而负其责者。’这是不无道理的。”^②就词学研究而言，朱祖谋更是开来启后的关键人物，庚子事变后，他将全部学术精力投入到词籍的搜集、校勘、编辑等方面，为**20**世纪的词学文献学和史料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他所刻的《彊村丛书》里的宋人词集，多精抄、精校及影印之善本，远胜于当时王鹏运刻的《四印斋词》、吴重熹的《吴氏石莲庵刻山左人词》、吴昌绶辑的《双照楼景刊宋元词十七种》、陶湘汇印的《景刊宋金元明本词》，为后人的宋词或词学研究，提供了大量翔实可靠的文本资料。

20世纪初盛行的校词、刻词之风，实承乾嘉学派校订经史之余绪而来，是将清儒用之于经、史、子研究的考订校勘辑佚的朴学工夫，用之于集部的词籍。朱祖谋为集其大成者，但他同时又是这种传统学术的传薪者，**20**世纪**30**年代前后成名

^① 《彊村遗书序》，载《彊村遗书》卷首，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② 《文学评论》**1985**年第**1**期。

的词学家，多与他有师生之谊。唐圭璋在《朱祖谋治词经历及其影响》一文中所例举的有：其一，龙榆生，“龙君沐勋年少好学，任教暨南，专攻词学，问业朱氏，孜孜不倦。朱氏喜其学有根基，因将所学于师友之词学以及一己学词之心得体会，悉以示之；对于历代词家之特色亦指陈详明。后龙君主编《词学季刊》，意在继承朱氏之教以发扬光大词学，为祖国文化做出贡献。”其二，夏承焘，“夏君承焘自学成才，受朱氏之奖勉，用力愈勤，成绩愈著。朱氏虚怀若谷，乐与论词。……夏君在杭大时，曾开设词学研究班，召大学毕业生学习，造就词学人才甚多，所著词学书籍，亦皆先后出版，其《唐宋词人年谱》一书，尤为空前之作，成就如此，庶不负朱氏当日对后辈之期望。”其三，杨铁夫，“杨君铁夫从朱氏学梦窗，多不解，朱氏但勉以多读梦窗词，积三年之久，朱氏始指出梦窗词中顺逆、提顿、转折之所在，并示以步趋之所宜。杨君从朱氏之教，作《梦窗词笺释》，于典之稍僻者笺之，意稍晦者释之，力破玉田‘七宝楼台’之说。使吾人加深对于梦窗词之了解，亦朱氏之所赐。”其四，刘永济，“刘君永济，对屈赋及《文心雕龙》均深有研究，近见其所著《宋代歌舞剧曲录要》、《词论》、《唐五代两宋词简析》诸书，知其于词学研究，功力亦深。其自作《诵帚龛词》二百余首，自序谓早年曾在沪上从朱、况二氏学词，宜其词之深造有得，不同凡响。”唐圭璋本人虽未获亲炙朱氏的机会，但自谓“读其词作与论著，受益良多”，可称私淑弟子，他曾为朱祖谋编的《宋词三百首》作笺注，又专撰此文，“缅怀朱氏对词学继往开来之贡献，因略述愚见，以志景仰之忱。”^①

在世事多变的时代，学术传统的师承命如悬丝而不绝于

^① 《江海学刊》1984年第1期。

缕，朱祖谋的学术贡献直至 20 世纪末乃被人提起。夏承焘的门人吴熊和在《彊村丛书与词籍校勘》中指出：“辑校《彊村丛书》，是朱祖谋在重校《梦窗词》与笺注《东坡乐府》的基础上进行的，代表了近代词籍校勘之学的最大成果。”认为其对今天词籍校勘仍有重要意义的是：一、尊源流，朱氏广辑宋金人之词，亦心存乎史，寓原始察终之意，他以敦煌抄卷《云谣集杂曲子》为丛书之冠，对于传布和研究敦煌曲子起了推动作用。二、择善本，丛书所收宋词别集 15 家中，出自宋本的即有 12 种，辑自《永乐大典》的 1 种，各种明抄、旧抄 2 种。朱氏为所校各本写了不少题跋，有关总集和宋人别集的就达 100 余篇，若编为一集，则成为宋人词籍的版本史。三、别诗词、补遗佚，存本色、订词题，这些都是朱氏于校勘时做的细致工作。他除了收讨善本，还拾遗补阙，新增了为数不少的辑本和补编本。四、校词律、证本事。依据声律校词，是朱氏丛书的独绝之处，包括校调名、校宫调、校自度曲、校句法、校字声和校用韵等。此外，朱氏四校《梦窗词》时，又考其本事为小笺，“笺与校相互发明，各有得益。”^①

词学研究在 20 世纪的宋代文学研究中成就最大，其成果远胜于宋诗和宋文研究，这与学有所成的几代词学研究者中存在着师承关系，亦即所谓“学统”，恐怕是分不开的。在宋代文学的基础研究方面，如别集校勘，总集编撰，作家生平考证和作品系年等，中国的传统学术积累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收集和整理资料的朴学考据方法，成为可师承的入门的工夫。

在 20 世纪初的宋诗研究方面，晚清宋诗运动中“同光体”的健将和诗论家陈衍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中坚人物；他和林纾、严复是同乡（福建人），都是在全国范围内享有盛名的

^① 《唐宋词通论》，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01—102 页。

学者，入民国以后，尤其是在“五·四”以后，他在传统诗学圈内仍受到尊崇。陈衍是读过严复译的《天演论》的，也懂得一些进化的道理，所以他论诗时力辟诗分唐宋之说，认为宋诗只是唐诗演化的结果，是诗到元和体变新后的一种发展变化，故从开、天到元和，为“世所分唐、宋诗之枢干也。”^①他在《何心与诗序》中提出“诗者，荒寒之路，无当乎利禄”的主张，明确说宋诗是“寂与困”者之诗，宋诗的风格境界为“清而有味，寒而有神，瘦而有筋力”。^②关于诗歌创作，他于《石遗室诗话》里一再标榜“有别才而又关学”的学人之诗，主张作诗要讲“实在工夫”，要学杜甫，要讲究“惨淡经营”、“一字不苟”，不要“全靠天分”。总之，“作诗文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非靠着一二灵活虚实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间，便自诧能事也。”^③提倡的完全是宋诗那一套创作方法。在论诗谈艺时，他强调先精微而后广大，尤注重诗之结构，所以能剖析入微，时出新解。

陈衍有关宋诗的种种看法，对后之论宋诗者颇有启发，尤其是他晚年编选评点的《宋诗精华录》一书，实为宋代诗选兼诗史性质的重要研究著作。朱自清在《什么是宋诗的精华——评石遗老人（陈衍）评点宋诗精华录》中，称赞“书中选录的诗甚有别裁”，为陈衍的创举。^④程千帆的《读宋诗精华录》认为，该书为石遗老人对于宋诗的“晚年定论”，其足供吾人之参证者有：第一，关于唐、宋正闰之意见。“详老人之意，于唐、宋分疆，未加抑扬，实持平之至论。……吴之振《宋诗抄序》云：‘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

① 《剑怀堂诗草序》，《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67 页。

② 《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67 页。

③ 《石遗室诗话》卷八，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第 61 页。

④ 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70 页。

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虽就宋立言，与老人殆有符契之合矣。”第二，关于所谓精华之界义。陈衍谓宋诗精华在近体而不在古体，殆所以救世人学宋之弊焉。因“唐人以情替汉、魏之骨，宋人以意夺唐人之情，势也。浸假而以议论入诗，夫议论，则不免于委曲，委曲则不免于冗长。长则非律绝所任，此所以逮宋而古诗愈多也。其极至句读不葺，而文采之妙无征；节奏不均，而声调之美遂闕。此宋人之短，非宋人之长。”第三，关于宋诗分期之说明。陈衍此录分四卷编排，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四期，每期一卷，认为宋不异于唐。“老人此论，盖以宋诗于唐，有类中兴，亦分四期，用资比附。夫截断众流以分期，所以便叙述研讨也。苞举众家以分派，所以便欣赏批评也。”^①朱自清编《宋五家诗抄》，程千帆有关宋诗的说明，颇有受益于石遗老人的地方。钱基博对陈衍极为推崇，称之为“并世文章之雄。”^②受其影响，钱锺书对陈衍亦很尊敬。

传统学术的影响，除治学方法的前后师承外，还有思想观念的因袭。世纪初出版的国人撰写的中国文学史著作，虽是仿照国外学者的同类著作编成，但在观念上却是很守旧的。如林传甲 1909年编的《中国文学史》讲义（于 1910年由东京宏文堂印刷出版），著者在该书《前记》中称“将仿日本久保天随 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例，家自为书。”可仿照的只是书的体例，对日本学者重视小说、戏剧的文学观不予采纳，坚持中国传统的杂文学观，将文字音韵学、训诂学、经学和史学的内容写进书中，与其说是文学史，倒更像是一部学术史的著作提纲。稍后出版的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

① 《古诗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版，第 145—146页。

② 《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载《国专月刊》第一卷第一期，1937年。

学史》，是两部当时公认为较好的文学史著作，但内容也很杂。如叙述到宋代文学时，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说：“唐之取士以诗赋，宋之取士以策论，故宋之文学，不在诗而在文，文主明义理，故韩愈所倡导之散文，为适于发达焉。其间文运之变迁，亦可肇分一时期。前半期振复古之气运，后半期导八股之产生。”^①遂将有关宋代文学的论述重心放在宋之学术文章方面。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亦云：“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经术至宋代一变，学者益究心纯理，故文体往往平正可观。……于是杂文学并兴，体制日盛，颇异前代。”所以他将“文体”、“诗体”、“词曲”、“俗语文体”与“史学”、“考证之学”并论。^②如朱自清所说：“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叙述纲领是时序，是文体，是作者，缺少的是‘一以贯之’。”^③这种缺陷的产生，与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有关。文学观念不变革，难以写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

二、新观念、新方法的输入

20世纪初是思想观念急剧变革的时代，一部分知识分子已开始以西方思想来定位中国的学术文化和文学研究。1905年，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强调指出：外界势力于学术发展的影响十分巨大。汉儒以抱残守缺为事，使吾国思想凋敝，学术停滞，六朝至唐代，有佛教的输入，中国思想第一次受外力的影响而发展。但“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

① 《中国文学史》下册，上海泰东图书局1923年版，第127页。

② 《中国大文学史》卷八，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2页。

③ 《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林庚著 中国文学史 序（四）》，载《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①把西方思想的输入，作为改变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停滞不前状况的外力。在同年所作的《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王国维说：“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夫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其国民之思想可知矣。”他指出：“抑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綜括）及分析（分析）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吾国人之所以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也。”^②按：“綜括”又可译为“归纳”，中国的传统学术中也有归纳法，但只是特殊事实的简单排比和综合陈述，缺乏具有抽象思辨力的一般归纳，故鲜有理论概括之习惯；所以王国维认为中国学术尚未达自觉地位，因抽象与分类二者皆为国人之所不长。又说严复为创造新学语的名家，但他将西语“天演”译“天演”，实不如译为“进化”一词来得确切。

自1895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公开出版后，因落后挨打，中国人很快就对达尔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有了切肤之痛的认同，于是如王国维所说：“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之于通俗之文。”（《论近年之学术界》）在文学研究方面，形成了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史观；还有对能反映国民之思想情感的平民文学的重视，亦即对小说、戏剧等大众文学的提倡；再就是对西方长于

① 《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47页。

② 同上书，第147页。

归纳分析的科学实证方法的借鉴。这三点是这一时期文学领域输入的新观念、新方法的主要内容，在王国维、鲁迅和胡适的古典文学研究论著中都有反映，尽管他们均非研究宋代文学的专门家，但他们对宋杂剧与话本小说的有关论述，对宋词的反传统看法，开创了以现代文艺学观念和科学方法研究宋代文学的范例。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作于1904年，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改名《宋元戏曲史》，这是20世纪最早出现的中国戏曲史著作。在此之前，中国的士大夫文人对源出民间的戏曲小说不屑一顾，以至这一类反映大众审美趣味的属于平民文学的作品鲜有人问津。更不用说进行分门别类的深入研究了。王国维在此书的《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独元人之曲，为时既近，托体稍卑，故两朝史志与《四库》集部，均不著于录；后世儒硕，皆鄙弃不复道。……遂使一代文献，郁堙沉晦者且数百年，愚甚惑焉。”为了究元曲之渊源而明其变化之迹，他对宋金时期的杂剧和院本作了认真的考辨，说“凡诸材料，皆余所收集；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① 这决非自夸之谈，该书共15章，前七章专门阐述中国戏曲的源流，除第一章谈“上古五代之戏剧”外，以下各章引述大量材料，论说宋金时期与戏曲有关的各种民间伎艺在形成“真正之戏剧”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涉及到“宋之滑稽戏”、“宋之小说杂戏”、“宋之乐曲”、“宋官本杂剧段数”、“金院本名目”、“古剧之结构”等内容，颇多前所未有的创获。如宋代讲唱文学“诸宫调”与后代戏曲的关系，自元末就很少有人知道了，王国

^①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年版，第1页。

维以确凿的证据说明《董西厢》就是“诸宫调”，正确地解释了这一名称的含义，并说明它与杂剧与金院本的关系。

在《宋元戏曲考》中，王国维用较科学的分析和归纳方法，对于中国戏曲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总结，他给戏曲下的定义是以歌舞演故事，认为“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①对戏剧是综合艺术有清楚的认识，较为准确地概括出了中国传统戏曲的艺术特征。他对宋金戏剧的研究，成为后来人们进行此类研究的基础，尽管在一些具体结论方面有后出转精的看法，但在总的研究格局方面，却很难超越王国维划定的范围。更为重要的是，此书开创了对民间戏曲文学的历史予以重视和科学研究的先例，反映了一种新的平民文学观。书中所提出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点，虽已有人说过，但王国维是从文体演进的角度立论的，反映了一种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文学发展史观，因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与过去戏曲不受重视相似，从宋代民间“说话”艺术中产生的白话通俗小说——话本小说，一向也受到正统文人的鄙视和排斥。直到近代，宋代的一些讲史话本才引起注意，但最初只是作为一种孤本秘籍而得到版本学家的青睐。清人黄丕烈于嘉庆年间将《宣和遗事》编入《士礼居丛书》刊刻时，只是把它作为宋本书看待，并不了解它的内容性质。辛亥革命前夕，董康刻印了《五代史平话》（民国5年），其后，缪荃孙于民国5年刻印了《京本通俗小说》（此书恐为伪托），罗振玉在民国5年影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样，在民国世纪初，所谓宋人话本四种才逐渐为世人所知。鲁迅于民国至民国年间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对宋代的“说话”和话本小说的重要历史地位予以肯定，并列专章加以论述，这在当时也是一

^① 《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 民国年版，第 民国页。

种不同流俗的创举。在详尽占有资料的基础上，鲁迅用进化史观建构了中国小说史的全新体例，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说：“许多历史家说，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那么中国当然不会在例外。……文艺，文艺之一的小说，自然也如此。”^① 鲁迅把中国小说史看作是一个由初级到高级的演进过程，有不断进化的趋向，并按照其历史时期划分为六个发展阶段，即：以神话、传说为主的小说阶段；六朝志怪、志人阶段；唐传奇阶段；宋元话本、讲史阶段；明朝演义、神魔、人情小说阶段；清朝拟古、讽刺、人情、狭邪、侠义及公案和谴责小说阶段。这种以大量文献为根据的科学的小小说分类，一举奠定了整个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布局。关于“宋之志怪及传奇文”、“宋之话本”、“宋元之拟话本”，鲁迅均有经典性的论述。他认为志怪传奇到宋代文人手里已无独创性可言，但市井间有以俚语著书的“平话”产生，即今所谓“白话小说”是也，此为中国小说史之一大变迁。这些论断常为研究宋代小说者引以为据。

自称“有历史癖”的胡适，也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感兴趣，常做些考据文章。他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② 胡适对宋代话本小说也发表过意见，但影响不大，就宋代文学研究而言，他有影响的著作是于 1928 年至 1935 年编注的《词选》。该书 1935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胡适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和一切新文学的来源在

① 《中国小说史略》“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 页。

② 《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上），中华书局 1985 年版，第 1 页。